

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王莉欢

在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紧密交流与合作,而日本—东盟政治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早在 1977 年,日本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并通过工业、科技、文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各种合作项目,开始与东盟建构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则是在冷战结束后才积极争取与东盟建立正式关系。1991 年中国第一次参与东盟外长会议,并在 1996 年由东盟的磋商伙伴提升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始频繁的高层领导人互访及政党交流。进入 21 世纪,中国与东盟各国已从双边关系发展到区域性的多边合作关系,合作的内容扩展到金融、人力资源、卫生防疫、司法等领域。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中国不仅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并且成为首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地区外大国。2002 年,中国和东盟还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也从非正式轨道转入正式轨道。在经济方面,相应的两对双边关系发展一快一慢的现象更为明显。进入 21 世纪,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以年均 12.4% 的速度增长,而日本和东盟的贸易总额则呈现年均 3% 的负增长。

数据来自 ASEAN Secretariat, 见 <http://202.154.12.33/trade/publicview.asp>。

《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 3 期(总第 7 期),第 34—64 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为何快于日本—东盟关系发展?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已有相关研究的长处和不足,并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描述冷战后中国、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和特点。第四部分比较中国、日本、东盟的一体化政策,并说明其对中国、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研究的总结。

一、既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思路

已有研究对冷战结束后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缓慢,而中国—东盟关系发展速度较快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对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发展的解释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认为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为中国与东盟改善关系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再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此外,在两极格局消失的大环境中,其他因素如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同步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也促进了中国—东盟关系快速发展。

第二种解释比较关注中国和东盟政策的转变。当然,中国和东盟对彼此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同它们的内部发展和对冷战结束后新国际环境的认识密切相关。例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北京政治风波”使中国更重视并且积极发展与亚洲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此外,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共同点增加,如内部发展目标(追求经济发展和繁荣)和对外战略(中国推动多极化世界和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的一致,以及价值观的趋同(亚洲价值观)。这些

L. L. To,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13, No 1, 2001, pp. 61—71.

例如,陈乔之:《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Derek da Cunha,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Future Security Role in its 'Backyard',"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37/CF137>. Chap6. pdf.

Zhao Quansheng,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0—215.

Joseph S. Y. Cheng, "ASEAN's Role in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in Sharon Siddique and Sree Kumar, eds., *The 2nd ASEAN Read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pp. 430—434.

因素也是促进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发展的动力。

然而,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不足之处。第一种解释强调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消失有助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东盟关系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日本—东盟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第二种看法强调中国、东盟政策的转变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影响。本文对此持肯定态度,但这一解释也没有详尽说明90年代末中国—东盟关系加速发展的原因。

对冷战结束后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缓慢的解释大体上也有两种。第一种强调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认为历史问题、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民众士气低迷、政局的动荡、领导精英缺乏创新思维,以及执政党为选票而坚决保护国内市场等等,都是制约日本—东盟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因。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尽管外部因素要求日本调整其对外战略,但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中趋于维持现状派继续主导政策使得日本外交作为不大,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亚洲(包括东南亚)的政策上。

第二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仍然无法摆脱一些传统原则和心态的束缚,如日本以日美关系为重心,以利益为本的原则和缺乏亚洲认同感,都是日本发展与亚洲国家(包括东盟)关系的主要障碍。在这类研究中,有些强调日美同盟对日本对外政策的牵制作用,有些则强调日本无法“脱美入亚”的主观因素对日本和亚洲国家关系发展的限制作用。有的研究还认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固然不如美国,甚至不如中国、韩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

以上两种解释也有不足之处。第一种解释认为由于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的限制,日本的对外政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这种解释与事实有些不符。

例如,李文:《日本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向》,2004年1月4日,<http://www.cass.cn/chinese/-28ytsnew/xueshuwz/showcontent.asp?id=239>; Yoichi Funabashi, "New Challenges, New Frontier: Japan and ASE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 Pacific Lecture Series*, No. 3 (Singapore: ISEAS, 2003)。

T. J. Pempel,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Asian Regionalism," in S. Javed Maswood, ed., *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44—45。

如见刘江永:《国际论坛:日本眼中的亚洲》,《环球时报》2004年4月2日,第15版。

Lam Peng Er, "Perceiving Japan: The View from Southeast Asia," in Derek da Cunha, ed.,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Singapore: ISEAS, 2000), pp. 144—145。

应该说,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政策曾经历了一些调整,尤其是桥本和小泉出于各种考虑都采取了行动来深化与东盟的关系。至于第二种观点强调日本以日美关系为重心和缺乏亚洲认同感对日本—东盟关系的制约影响,这种解释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它忽视了东盟本身内部和对外政策的变化,因而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

一些已有的研究也尝试从东盟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探析,强调东盟的中国观和日本观变化的影响。而事实表明,这一变化对两组双边关系的发展似乎影响不大。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领土争端激化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戒心有所上升,但这并没有妨碍1991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并在1996年升格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相反,到80年代末东盟对日本的疑虑和戒心已大大消减,但这并没有明显促进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发展。

由于影响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政治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一因素无法解释这两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本文采用多种因素的解释方法,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自1997年以来,中、日与东盟政治关系快慢发展对比鲜明的现象显得更为突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把中国和东盟推向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尤其体现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的稳定作用获得东盟对中国的信任和好感。危机后,中国不仅积极呼应东盟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要求,并且通过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来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而日本则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区域一体化显得不积极。尽管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构想,但东盟对日本的这些举措仍比较迟疑。由此,笔者认为,中、日关于一体化政策的区别是导致中、日与东盟政治关系发展一快一慢的主要原因。具体的研究思路可参见图-1。

Chin Kin Wah, "Regional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in Chandran Jeshurun, ed., *China, India and Jap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1993), pp. 3—25; Julius Caesar Parrenas, "China and Japan in ASEAN's Strategic Percep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2, No 3, 1990, pp. 198—224.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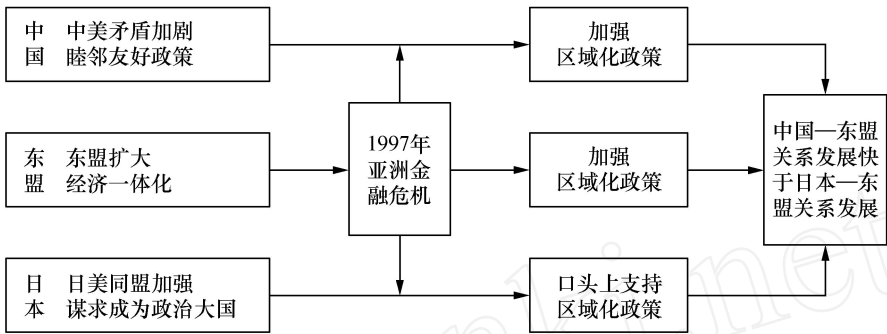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思路

二、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

20世纪 90年代之前,中国与东盟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在六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同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 90年代,中国开始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0—1991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并与新加坡和文莱建立外交关系。1991年,中国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东盟外长会议。图-2表明,中国—东盟高层领导人互访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加。不过,在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威胁论”对东盟国家影响较大。不少东盟国家非常担心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东亚地区的新霸主,并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此时,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举措,比如,1992年 2月通过领海法及 1993年出版南海地图,也在一定程度让东盟国家感到不安。此外,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主办的一系列关于南海争端的非官方会议也持冷淡态度。

1994—1996年,“中国威胁论”的渲染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激化对中国—东盟政治关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94—1995年,中国与菲律宾首次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争议。出于对中国的疑虑,东盟努力推动中国加入首

Ang Cheng Gua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IDS Working Paper*, No. 4, 1999, pp. 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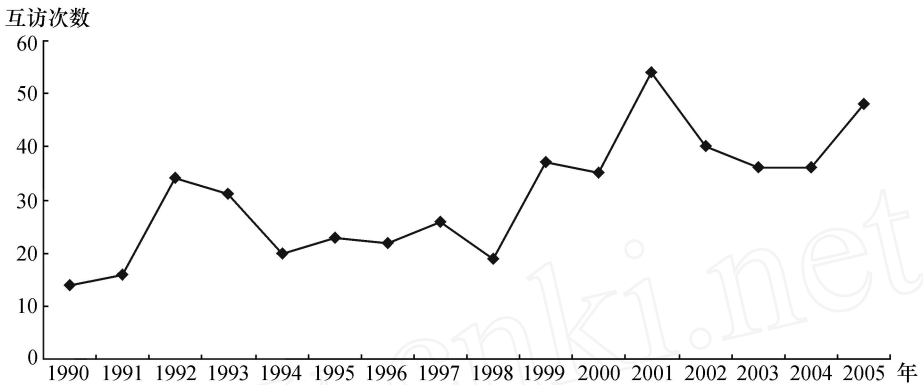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东盟领导人互访 (1990—2005)

资料来源:参见表-6。

届东盟地区论坛 (ARF),其主要目标是“规范”中国行为。当时,中国对参与类似 ARF这样的地区多边组织并不积极,担心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通过多边外交制约中国。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东盟开始建立一些层次较低的对话机制,以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消除紧张气氛。1995年4月,双方举行了首次副部长级中国—东盟资深官员协商会议 (ASEAN SOM),旨在加强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了解与信任。会议期间,东盟把南海问题提上议程,试图以集体力量与中国进行磋商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同年,在经济领域,中国与东盟也成立了两个联合委员会,以推动经贸和科技合作。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

1997—200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不仅级别有所提升,并且进入了制度化发展阶段 (参见图-3)。1997年,中国与东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东盟“10+1”领导人会议。除了 ARF、东盟外长会议扩大会议 (1996年开启)和 ASEAN SOM之外,中国和东盟还可以通过刚开启的东盟“10+1”和东盟“10+3”领导人会议机制进行高层政治对话与交流。在工作层方面,1997年,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 (ACJCC),旨在加强政策协调和

Rosemary Foot, “China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Organisational Processes and Domestic Modes of Thought,” *Asian Survey*, Vol 38, No 5, 1998, p.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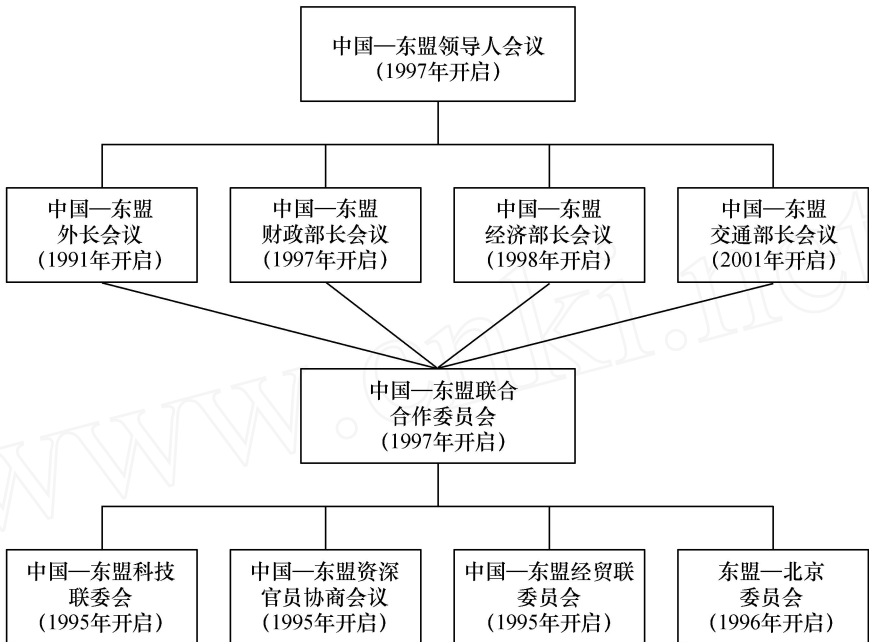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与东盟主要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层级

信息沟通,在工作层次上协调和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合作,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开发、人员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ACJCC负责协调的工作层对话与合作机制主要有4个,包括ASEAN-SOM、中国—东盟经贸联合委员会、中国—东盟科技联合委员会和东盟—北京委员会(1996年开启)。1999年3月举行的第2次ACJCC会议提出了4个建议:第一,加强人员交流;第二,举行研讨会让年轻的东盟外交官了解当代中国;第三,举行有关东盟—中国经贸合作的研讨会;第四,召开东盟和中国科学家合作交流的工作会议。1997年,中国出资70万美元成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资助ACJCC推动的合作项目。2000年,中国又增资500万美元,主要用于资助与东盟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

“Joint Press Release: The First 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Beijing, 26—28 February 1997,” <http://www.aseansec.org/5880.htm>.

ibid

建立相互信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得以加强的基础。进入 21 世纪,在安全领域,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增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信,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02 年 11 月,双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2003 年 10 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并表示有意加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但成为中国与东盟建立信任的一个重要措施。《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强调:“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双方还建立了工作小组定期讨论南海问题。2005 年 3 月,中国开始同曾因南海问题发生过摩擦的越南和菲律宾共同开展南海石油调研工作。

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也增强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东盟“10+3 领导人会议机制”则提供一个中国与东盟进行安全合作的平台。2001 年第 5 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东盟“10+3 机制”应该在侧重经济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并且可首先从非传统安全问题着手。2002 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4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有关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执行 2002 年的联合宣言。

在经济领域,中国也采取重要举措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在 2000 年举行的第 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针对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加入 WTO 后可能对东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成立专家组,展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2001 年 11 月,在第 5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确定双方重点合作领域,即农业、信息产业与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双边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等;第二,推动在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加强政治上的互信和支持,不断拓展双方的政治对

“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www.aseansec.org/13163.htm>.

“Press Statemen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7th ASEAN Summit and the 5th ASEAN+3 Summit, November, 2001, Bandar Seri Begawan,” <http://www.aseansec.org/5317.htm>.

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同年,中国首次发表了《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为了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国宣布将向东盟成员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即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希望东盟相信,尽管中国加入WTO之后市场更开放,更具竞争力,但中国的繁荣将给东盟带来机遇,而非构成挑战。中国表示愿意向东盟提前开放市场,并为东盟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帮助东盟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推进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使双方的经济利益更加交融,使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逐步加深。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双方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年,中国与东盟制定了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在政治、经济上增强互信的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军事关系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与6个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协定。在过去几年里,双方军事交流不断。据统计,2003—2005年,中国向9个东盟国家共派出42个国防代表团,而10个东盟国家则向中国派出了44个军事代表团(参见表-1)。更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中国分别与菲律宾和越南开启了副国防部长级别的双边国防与安全对话机制。

表-1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军事互访(2003—2005)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印度尼西亚往中国	1	3	0
中国往印度尼西亚	0	1	0
马来西亚往中国	0	0	1
中国往马来西亚	2	3	5
菲律宾往中国	2	3	1
中国往菲律宾	1	1	1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th ASEAN Summit and the Three ASEAN + 1 Summits, Brunei Darussalam, 6 November 2001,” <http://www.aseansec.org/5316.htm>.

(续表)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泰国往中国	3	3	3
中国往泰国	1	4	3
新加坡往中国	0	1	1
中国往新加坡	1	1	2
文莱往中国	0	1	1
中国往文莱	3	1	1
越南往中国	2	3	6
中国往越南	0	3	1
缅甸往中国	1	1	1
中国往缅甸	1	3	1
老挝往中国	1	1	1
中国往老挝	0	1	1
柬埔寨往中国	1	1	1
中国往柬埔寨	0	0	0

资料来源:根据新华通讯社新闻报道统计。

三、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

从 1990—2005 年,除了三位执政时间最短的首相之外,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出访过东盟国家(见表-2)。历任日本首相也都选择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抛出对东盟政策的原则性主张,主要有 1977 年的“福田主义”、1987 年的“竹下主义”、1997 年的“桥本主义”和 2002 年小泉的东盟政策纲领性讲话。尽管如此,日本和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局动荡,在短短的 10 年内日本就更换了 6 位首相(见表-2)。1990—1996 年期间,尽管日本首相海部、宫泽和村山都出访过东盟国家,而且就日本对东盟政策提出一些主张,但都是口头宣言,并未形成具体政策。

表-2 历任日本首相出访东盟国家 (1990—2005)

执政时期	日本首相	出访
1989—1991 (1年 7个月)	海部俊树	1991年出访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1991—1993 (1年 9个月)	宫泽喜一	1993年出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
1993—1994 (8个月)	细川护熙	
1994 (59天)	羽田孜	
1994—1996 (1年 6个月)	村山富市	1994年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
1996—1998 (2年 6个月)	桥本龙太郎	1997年出访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
1998—2000 (1年 8个月)	小渊惠三	2000年出访柬埔寨、老挝和泰国
2000—2001 (1年 1个月)	森喜朗	
2001年 4月至今	小泉纯一郎	2002年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90年代末,日本—东盟关系进一步制度化。1997年 1月,桥本首相出访东盟国家期间发表政策性讲话,提出拓展和深化日本与东盟之间的交流,促进日本与东盟在各个领域、各个级别的对话。从 1997年开始,以往不定期举行的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改为年度会议。虽然日本和东盟早在 1977年就召开了首次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但第 2和第 3次会议都是隔了 10年后才召开(第 2次在 1987年举行,而第 3次在 1997年举行)。1998年,日本启动了局长级别的日本—东盟磋商小组会议。同年,又在 AEM—MITI 部长会议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Minist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Consultations)之下设立经济工业合作委员会,旨在促进日本与东盟的工业合作,协助东盟国家增强工业竞争力,并为东盟新成员国提供发展援助。根据桥本的提议,日本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pmv9701/policy.html>

同上。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ASEA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pmv9812/relation.html>

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合作机制,如日本—东盟发展圆桌会议、日本—东盟全面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南南发展合作、日本—东盟反恐会议等,并在其任期内都得以实施。从图-4可以看出,1998—2000年,日本和东盟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日本与东盟主要对话与合作机制和会议召开次数,参见图-5和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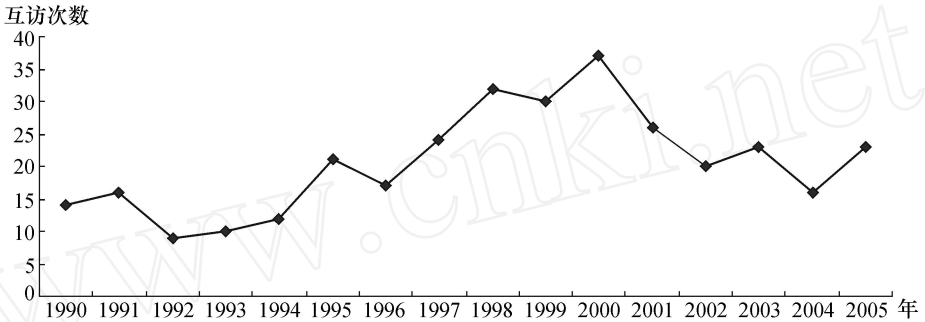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东盟领导人互访 (1990—2005)

资料来源:参见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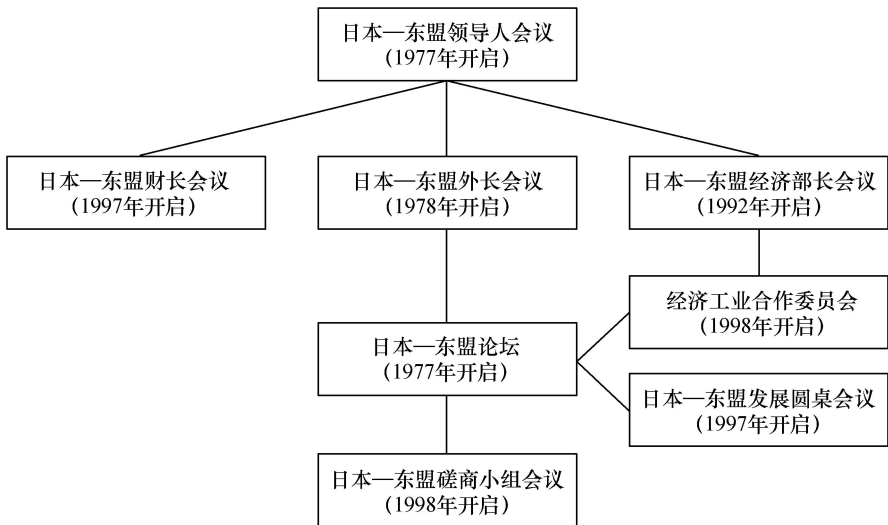


图-5 日本与东盟主要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层级

资料来源: <http://www.mofa.jp/region/asia-paci/asean/pm9812/relation.html>

Sueo Sud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45.

表-3 日本与东盟会议召开次数(1990—2005)

年份	日本—东盟 外长会议	日本—东盟 论坛	日本—东盟 经济部长会议	日本—东盟 财长会议	日本—东盟 领导人会议*
1990	第 13 次	第 12 次			
1991	第 14 次	第 13 次			
1992	第 15 次		第 1 次		
1993	第 16 次		第 2 次		
1994	第 17 次		第 3 次		
1995	第 18 次	第 14 次	第 4 次		
1996	第 19 次		第 5 次		
1997	第 20 次	第 15 次	第 6 次	第 1 次	第 3 次
1998	第 21 次	第 16 次		第 2 次	第 4 次
1999	第 22 次			第 3 次	第 5 次
2000	第 23 次		第 7 次	第 4 次	第 6 次
2001	第 24 次	第 17 次	第 8 次	第 5 次	第 7 次
2002	第 25 次	第 18 次	第 9 次	第 6 次	
2003	第 26 次	第 19 次	第 10 次	第 7 次	
2004	第 27 次	第 20 次	第 11 次	第 8 次	第 8 次
2005	第 28 次	第 21 次	第 12 次	第 9 次	第 9 次

* 第 1 次会议在 1977 年举行,第 2 次在 1987 年举行。

1997 年,桥本提出与东盟共同致力于解决恐怖活动、贩毒和环境等全球性课题。在此之前,日本与东盟对话的内容已从以往的贸易与投资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问题。从 1993 年开始,日本—东盟论坛的议题开始涵盖政治和安全问题,并升级为双方副部长级高官定期进行政策性对话的平台。1995 年,一年一度的日本—东盟外长会议也升级为日本与东盟就全球和地区问题进行政策对话的平台。1999 年,日本和东盟开始尝试共同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安全问题,小渊提议召开一次反海盗国际会议。2000 年 4 月该会议正式举行,包括东盟 10 个成员国在内的 16 个国家参加了此次会议。2001 年,小泉重申希望与东盟就反恐、反海盗、环保和防止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2004 年,日本与

东盟发表了反国际恐怖主义合作的联合宣言。2005年,小泉承诺提供1亿美元推动防止传染病的倡议。

2004年,日本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标志着日本和东盟的安全关系前进了一大步。由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一直对加入该条约较为消极。日本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是,不想落在中国之后,因为中国已在2003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

四、中、日、东盟区域化政策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一) 东亚区域化进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深化东亚地区合作和区域化的转折点。1997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际,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3”合作机制应运而生。由于一些东亚国家(如日本)对东亚合作的态度仍较为消极,东盟“10+3”会议只能以低调方式进行,最初两年的领导人会议上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1997—1999年,东盟“10+3”会议以经济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为重点,加强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如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和监控短期资本流动,以确保地区的金融与货币稳定。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对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愿望不断加强。1999年11月的第3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决定扩展东亚各国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从2000年开始,东亚各国在东盟“10+3”框架下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作形式日趋多样化,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见表-4)。同时,东亚各国也开始在一年一度的东盟“10+3”领导人会议框架下建立一系列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等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磋商机制。例如,从2000年开始,除了“10+3”外长会议,还开启了定期举行的“10+3”经济部长和财长会议以及“10+3”高官会议等。

Sudo, *Evolution of ASEAN-Japan Relations*, p. 53.

表-4 东盟“10+3”合作范围的扩展

年份	领域
2000	政治与安全、经济、贸易与投资
2001	农业、渔业与林业、人力资源、科技
2002	环境、旅游
2003	文化艺术
2004	能源、卫生、信息技术与通讯、社会公益、跨国犯罪与反恐怖

资料来源：<http://www.aseansec.org/AR05/PR-Partnership.pdf>

进入 21 世纪,东亚各国在“10+3”框架下推动东亚区域化的措施逐步展开。2001年 11月举行的第 5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决定由“东亚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的《迈向东亚共同体》报告。报告建议,各国政府把东亚一体化当做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并提出各种建议促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包括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02年举行的第 6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讨论了东亚展望小组的最终报告,并同意研究和制定具体方案,逐渐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03年,第 7次“10+3”领导人会议同意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确定为长远目标。2004年,第 8次“10+3”领导人会议又将建立“东亚共同体”确定为长远的目标,并决定 2005年 12月召开第一届东亚峰会。

(二) 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

1. 中国的区域化政策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着眼双边而不是从区域角度出发。然而,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参与国际多边组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和交流。从 90年代开始,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多边外交、

Report of the East Asian Vision Group,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t_asia_vision.pdf

门洪华:《参与、创设与主导:以国际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进东亚一体化》,《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冬季号。

区域和次区域关系的概念,体现了中国新的外交姿态。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新外交日益显现,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

1990—1993年,中国积极开展与东盟的多边合作,并争取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80年代,虽然中国对外政策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交往中的互信程度并不高,因此中国很难与东盟顺利推动多边合作。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变。90年代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纷纷复交或建立外交关系。这有助于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信,为中国和东盟的多边合作创造了条件。

1994—1996年,中国逐步接受了区域概念。1994年,加入 ARF使中国逐步改变了以往对多边组织与机制的怀疑和观望态度。在 ARF酝酿期间以及成立初期,中国担心 ARF受美国支配,因此对其持保留和谨慎态度。经过数年的观察和适应,中国逐渐意识到 ARF不大可能演变为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

1997—2000年,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信心更加坚定,并积极推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中国不仅参与现有的区域性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并且积极发起和推动一些多边机制的建立。1997年,中国和东盟携手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了东盟“10+1”和“10+3”领导人会议机制。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东盟“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如 1999年,中国提出召开副财长和副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如何改造国际金融制度的架构。

中国认识到,北美、欧洲和东亚将是 21 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因此将东亚一体化视为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加以推动。2001—2005年,中国不仅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并且开始主动着手主导构建区域性多边合作的制度框架。2001年 11月,中国提出与东盟强化经济合作关系,倡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 5月,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新外交做了不少分析与研究,可参见的文献有: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世界知识》2004年第 4期;方长平:《多边主义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 5期等。

并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磋商。同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合作范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早期收获计划”以及其他加强经济合作的措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还确立了 2010 年与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及 2015 年与东盟新成员国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为了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04 年 1 月中国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使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新成员国能够享受货物关税优待。2004 年 11 月,双方签署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并于 2005 年 7 月付诸实施。同时,中国与东盟还开始就服务贸易和投资进行谈判。

除了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外,2002 年 11 月,中国还提出与东盟在其他五个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双向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中国对湄公河流域开发表现积极,并宣布将通过参与东盟次区域开发,协助东盟缩小内部的发展差距。为了协助东盟促进内部一体化进程,中国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基金”资助《东盟一体化倡议》中的一些项目,还为改善东盟新成员国内河流与水道的项目提供了资助。2003 年,中国决定加大对《东盟一体化倡议》的投入,支持包括东盟东部增长区在内的各项次区域合作。2005 年 12 月,中国正式成为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发展伙伴。

与日本不同,中国集中精力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非与个别东盟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因为中国担心若与个别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分裂东盟市场,破坏“10+3”东亚合作进程,并将阻碍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自“10+3”东亚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中国积极提出各种建议和项目,扩展和深化“10+3”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例如,2001 年,中国推动“10+3”农业和林业部长会议,并主办了东亚农业科技与合作商务论坛。中国还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和一体化理论与政策的探索。2002 年 11 月,中国主动认可了东亚展望小组研究报告中的一项建议,即在东盟“10+3”框架下建立一个“东亚思想库网

ASEAN Annual Report 2002—2003, <http://www.aseansec.org/viewpdf.asp?file=/ar03/pdf/Chapter5.pdf>

bid
bid
bid
bid

络” ,并于 2003年组建完成。“东亚思想库网络 将对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形成年度报告并提交给东盟“ 10 + 3 的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日本的区域化政策

一直以来 ,日本并不热衷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而且对地区主义的兴起感到担忧。日本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出现会对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 ,日本一向注重推动世界多边自由贸易 ,重视世贸组织等国际经贸机制 ,而将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视为扩大世界贸易的辅助渠道。在区域合作层次上 ,日本更是缺乏清晰的策略。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世界各地域一体化深化 ,地区主义兴起 ,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构思框架随之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1990—1993年 ,日本对区域一体化持反对和批评态度 ,也不热衷于推动区域合作。例如 ,面对当时欧共体的进一步整合 ,日本认为类似欧共体的市场一体化不应该成为“封闭式地区主义”或保护主义 ,而应该向全世界开放。日本还强调 ,将极力维护和完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由于日本奉行跟随美国的对外政策 ,而美国不希望东亚出现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强大经济集团 ,因此日本一直不愿着力于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合作制度化。相反 ,日本积极支持 APEC的运作 ,主要原因是 APEC是泛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 ,仅具有论坛和协商功能 ,不具备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 ,所以可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1991年 ,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组织 ,并把日本看做东亚合作的主要领导力量。但是 ,日本却拒绝担任主导力量 ,并强调东亚地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以防止形成类似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经济集团。日本之所以持消极态度 ,原因是美国强烈反对成立东亚经济组织。1991年的 APEC部长会议上 ,日本公开表示对 APEC的坚定支持 ,并认为东亚经济组织有发展成为“封闭式地区主义”的危险。

1994—1996年 ,日本意识到东亚区域合作和地区主义潮流逐步上涨且不

参见 NEAT网站 ,http://www.neat.org.cn/gwm/index.php?topic_id=001002。

同上。

参阅 1990—199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得出的结论 ,见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

可阻挡,而东亚地区内部呈现的经济活力日益显现。日本迫不得已开始参加东亚地区集体活动,但对东亚区域一体化和东亚区域合作仍有疑虑。《1996年外交蓝皮书》中,日本首次提出应该采取包括三个层次的对外合作框架,即国际、区域和双边合作框架。该蓝皮书首次提出区域层次合作的政策,并强调日本必须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合作。然而,日本仍积极维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支持美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作用,并继续将 APEC 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典范。1995年,东盟准备开启东亚会议(ASEM),并邀请日本参加。起初,由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置之门外,日本并不赞同召开 ASEM。后来,由于欧盟对东亚地区主义的认可,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96年3月,首届 ASEM 的举行标志着欧盟与东亚跨区域合作的开启,而日本决定参与其中是要防止自身被欧盟—东亚跨区域合作机制排除在外。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意识到东亚地区金融与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因为东盟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金融与货币不稳定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同年7月,日本提议设立亚洲货币基金(AMF)为泰国和其他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盟国家提供紧急资金协助。这一建议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最终迫使日本放弃了建立区域性金融合作的设想,也使日本无法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1998年10月,日本宣布“新宫泽倡议”,决定通过传统的双边渠道为遭受打击的东盟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日本还为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的《清迈倡议》,即东盟国家与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双边货币兑换安排,提供了财政资源。然而,日本对1997年开启的东盟“10+3”领导人会议并不积极,不愿通过该会议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2000年首次东盟“10+3”外长会议上,日本外长依然强调东亚国家应该推广“开放式区域合作”。

进入21世纪,东盟“10+3”框架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迅速扩展和深化,促使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开始表现出积极态度。日本意识到,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趋势使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而东盟为提高竞争力则不遗余力地加快东盟一体化进程并推动更大范围的东亚一体化,因此日本必须顺应潮流,支

日本《1996年外交蓝皮书》,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6>。

持东亚区域合作,才能保持和加强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日本《2001年外交蓝皮书》指出,进入21世纪,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合作在加速,日本必须促进区域对话,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2000年,日本改变了以往反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立场,决定与新加坡开启双边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该蓝皮书认为,《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PA)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具有辅助作用。日本《2002年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将推动亚太地区的多层次区域合作。在新加坡发表的政策宣言中,小泉还提出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与东盟在多个经济领域中的合作。

到了2002年末,日本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经济伙伴协定(EPA)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2002年10月,直属日本外务省的经济事务局首次发表了日本FTA战略,随后该局还增设了主管FTA和EPA事务的部门,主要负责策划与协调一切有关FTA和EPA的事宜,确保统一行动。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订JSEPA后,宣布以JSEPA为样板,积极推动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及墨西哥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日本与东盟国家及东盟签订EPA的进程,请参见表-4)。日本《2004年外交蓝皮书》中,还首次增设了促进EPA和FTA的章节,指出世界各地建立EPA和FTA的潮流正在加速发展,并提出世贸谈判一直停滞不前,日本必须寻求其他途径(如EPA和FTA)来促进和扩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在WTO范围以外的经贸合作。此外,日本必须利用EPA和FTA来巩固与重要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

日本《2001年外交蓝皮书》,见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01/>。
同上。

日本《2002年外交蓝皮书》,见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02/>。

参见日本首相小泉发表的《日本和东盟在东亚:一种真挚和开放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小泉提出日本与东盟未来将在5方面加强合作:第一,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合作;第二,与东盟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来加强各个经济领域的合作;第三,开启一项东亚发展倡议,讨论未来发展合作;第四,把2003年设为日本—东盟交流年;第五,加强安全合作,包括跨国问题上的合作。参见 http://www.kantei.go.jp/foreign/koizumi_speech/2002/01/14_speech-e.htm。

日本《2004年外交蓝皮书》,见 <http://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2004/chap1.pdf>。
同上。

表-4 日本与东盟国家及东盟签订经济伙伴协定 (EPA) 进程

东盟国家	EPA 进程
新加坡	Japan-Singapore EPA (JSEPA): 2002年 1月签订,并于同年 11月生效。这是日本与东盟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随后,日本以该协定为样板,同东盟其他国家磋商双边贸易协定。
马来西亚	Japan-Malaysia EPA (JMEPA): 2003年 12月,两国发表联合研究报告,同意在 2004年初开启 EPA 谈判。2005年 5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协定的主要内容原则上达成共识。2005年 12月,两国首相签订 JMEPA。
菲律宾	Japan-Philippines EPA (JPEPA): 2002年 8月,两国成立 JPEPA 的工作研究小组。2003年 12月,两国决定在 2004年初开启谈判。2004年 11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协定的主要内容原则上达成共识,并将尽快敲定协定文本。
泰国	Japan-Thailand EPA (JTEPA): 2001年 11月,泰国首相达信同日本首相小泉提出进行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2002年 4月,两国同意开始磋商签订 EPA,谈判于 2004年 2月正式开启。2005年 9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协定的主要内容原则上达成共识。
印度尼西亚	Japan-Indonesia EPA (JIEPA): 2003年 6月,两国宣布进行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2005年 6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 2005年 7月开启谈判。
文莱	2005年 12月,两国同意就开启 EPA 谈判进行磋商。
越南	2005年 12月,两国结束就越南加入 WTO 的讨论,并同意设立联合研究小组,争取开启 EPA 谈判。
东盟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JCEP): 2002年 1月,日本首相小泉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 11月,日本与东盟签署《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的共同宣言。2004年 12月,第 9次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2005年 4月开启谈判,并希望用两年时间达成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还逐步改变了对东亚一体化的否定态度,开始公开宣传其东亚区域化构想。但是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仍忽冷忽热,若即若离。2002年 1月,小泉首次提出日本的东亚一体化构想,提议建立一个以东盟、中

国、日本和韩国为框架,并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在内的“东亚扩大共同体”。2003年12月,在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小泉又提出,建立一个以日本和东盟为轴心的“日本—东盟+2(中国、韩国)+2(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目标。2005年12月东盟会议期间,小泉又向媒体进一步阐述了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设计,表示日本希望通过参与东亚峰会,协助建立一个对东亚地区发展有所贡献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必须包括三大支柱,即“开放式区域主义”、“尊重民主、人权和WTO全球规则的共同价值”以及“促进社会经济事务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实际合作”。同年同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发表演讲,强调“日本是亚洲的经验领袖……在建立民主及市场经济方面,日本也比其他亚洲国家经验丰富”。他还重申,必须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拉进东盟“10+3”(中、日、韩)的框架,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而且“东盟内部应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一般认为,2002年日本官方提出的东亚一体化构想较为草率,并未经过周详策划或仔细研究,主要目标是限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例如,小泉2002年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主要动机就是不想落在中国之后。至今,日本对东亚一体化的态度和立场仍不是很明确。日本积极推动与东盟六个老成员国之间的双边EPA,但却不热衷于通过与东盟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来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可见,日本更多地希望通过签订双边EPA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全面经济关系,以在战略上防止东盟与中国走得太近。

由于担心中国通过建立东亚思想库网络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理论开拓和政策研究,2003年日本也开始对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进行研究,并于2004年5月成立了由前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主席的东亚共同体委员会,并举行了—系列研讨会,讨论日本应该如何评价东亚地区日益加强的区域一体化趋势,以及日本该作出怎样的政策反应。2005年8月,该委员会发布报告,提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必须坚持三项原则。第一,东亚共同体必须促进地区和平、

参见 <http://www.kantei.go.jp/foreign/koizumispeech/2002/01/14speech-e.html>

参见孟青、管克江、孙秀萍:《日本竟想当东亚领袖》,《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2日,第16版。

同上。

同上。

参见东亚共同体委员会的网站, http://www.ceac.jp/e/pdf/policy_report_e.pdf

进步与繁荣。第二,东亚共同体必须开放、透明和具有兼容性。第三,东亚共同体必须重视功能性合作而非制度化发展。报告还建议日本政府内阁设立一个部长级会议来专门负责东亚政策。

日本官方和学术界都意识到,不管日本是否支持东亚一体化,东亚地区内的相互依赖正日益加强,而且一种新型的地区秩序正在形成。但是,至今日本政府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仍然是说的多而做的少。2005年秋,日本外务省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发表文章,提出了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地区主义和一体化的原则性构想,但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纲领。此外,日本政府依然非常在意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看法,并认为美国不管在经贸或安全领域都是东亚地区不可取代的伙伴。日本国内的主流观点是东亚合作的大门必须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敞开,而且将来形成的东亚共同体不能与日美同盟相互抵触。

3 东盟的区域化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东盟的发展受到两大事件的深刻影响。一是东盟扩大。1995—1999年,东盟成员国数量由6个扩大到10个,成为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组织。虽然东盟扩大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并提高其国际地位,但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也随之出现,使东盟内部呈现一种不利于团结的二元化现象。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不仅结束了东盟国家1990年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还导致一些东盟国家陷入政治与社会动荡。1997—1998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机的摧残。1998年,东盟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为-8.4%。东盟最大成员国印度尼西亚所受打击最为严重。1998年5月,执政30多年的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体系发生了空前变化。这两大事件对东盟加快地区一体化、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1990—1993年,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巨变,东盟开始探

Yamada Takio, "Towards a Principled Integration of East Asia: Concept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18 November 2005, <http://www.ceac.jp/e/commentary/051118.htm>.

同上。文章提出4项原则:第一,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是一种“开放式地区主义”;第二,东亚合作一体化应该是功能性合作,而不需要以欧盟那种制度化方式发展;第三,东亚共同体必须以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等价值观为依托;第四,东亚共同体必须在安全领域方面加强信任与合作。

讨如何调整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来增强东盟团结和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1992年举行的第4次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了东盟新的政策方向。首先,扩大组织规模。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东盟开始探讨接纳印度支那国家,以扩大规模并提高其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其次,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与之相伴随的是地区经济集团的兴起,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应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挑战,东盟决定,从1993年1月开始,用15年时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推动内部贸易自由化,建立真正的统一大市场和生产基地,提高外资吸引力。最后,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1991年,东盟首次邀请中俄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此外,1992年的东盟领导人会议还决定加强区域安全对话,首次把地区政治与安全纳入外长会议议程。1993年,东盟还发起了以东盟为中心的ARF,即东亚地区唯一的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东盟国家更关心的是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和增强东盟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而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问题上并不积极,也未形成一致的看法。1991年,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EAEG)的设想,其他东盟国家的反应并不积极。尽管因马哈蒂尔坚持,东盟同意建立该组织,但决定将其名称改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并将其放置在APEC框架内。虽然东盟同意EAEG将探讨如何将东盟区域合作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但没有打算定期举行会议,甚至还强调不会让EAEG制度化或成为贸易集团。

1994—1996年,东盟致力于推动建立AFTA,实现大东盟的目标。1994年9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决定加快实现AFTA的步伐,把完成“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的时间从15年提前为10年,即把2008年实现AFTA提前到2003年。1994年7月,东盟提出实现大东盟的构想,其中包括实现大东盟的经济

“Singapore Declaration of 1992, Singapore, 28 January 1992,” <http://www.aseansec.org/5120.htm>.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2002, pp. 441—442.

ibid

ASEAN Annual Report 1991—1992, <http://www.aseansec.org/11491.htm>.

ASEAN Annual Report 1994—1995, <http://www.aseansec.org/9435.htm>.

一体化,推动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最终形成富有竞争力、能共同抵制外来压力和确保东盟集体利益的区域性经济集团。1995年12月,第5次东盟领导人会议再次提出加快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把实现AFTA的时间从2003年提前到2000年,即到2000年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必须把关税降低到0至5%。在此次会议上,东盟同时启动了接纳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加入的准备工作。由于认识到未来大东盟内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过大,东盟决定推动湄公河流域的发展。1996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东盟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的基本框架》,旨在推动东盟新老成员国间的经济整合。同年,东盟还制定了建立“东盟投资区”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来加强东盟对外资的吸引力。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外资对东盟国家的信心。东盟意识到,要扭转外资迅速下滑的趋势,制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就必须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1997年12月,东盟第二届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通过了《2020年展望》。其勾画出东盟的远景目标,即到2020年建成稳定、繁荣,而且资金、人员和商品等能畅通无阻流动且富有竞争力的东盟经济区。东盟决定2010年建成“东盟投资区”,2020年实现东盟内部投资自由化。不难看出,《2020年展望》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东盟国家士气,坚定商家和投资者对东南亚地区的信心。1998年12月,东盟第6次领导人会议推出了《河内行动计划》,制定具体政策实现《2020年展望》,包括加快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东盟在金融、科技、基础设施、通信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东盟还把实现AFTA的时间表又提前一年,即到2002年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将实现零关税目标。

亚洲金融危机还促使东盟意识到推动更大范围东亚合作的重要性。危机过后,东盟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差距加大,其国内生产总值由危机前占东亚国内生产总值的9.7%下降到7.6%。中国已取代东盟国家成为世界低成

“The Fifth ASEAN Summit,” <http://www.aseansec.org/9375.htm>.

ibid

“Press Statement of The Fifth Informal ASEAN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Jakarta, 30 November 1996,” <http://www.aseansec.org/5206.htm>.

“ASEAN Vision 2020,” <http://www.aseansec.org/5228.htm>.

“Hanoi Plan of Action,” <http://www.aseansec.org/8754.htm>.

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2期,第33页。

本制造中心,一些产业链的迁移绕开东盟,直接迁移到中国。东盟意识到,即使各成员国经济恢复,实现东盟一体化的目标也不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因此决定让东盟与东北亚地区融合起来,与东北亚三国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防止东盟边缘化,甚至让东盟占据东亚经济合作的轴心地位。1997年,东盟发起了东盟“10+3”对话与合作机制,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1998年举行的第2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决定把东盟“10+3”和东盟“10+1”对话与合作框架制度化,即每年定期召开会议。1999—2000年,东盟主要致力于推动与东北亚三国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合作,以使该地区形成一定的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更好地防范金融危机。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达成了《清迈协议》,决定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2000年11月,第4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东盟提出召开东亚峰会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和投资区的设想。

进入21世纪,除了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加强东盟一体化制度建设之外,东盟还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的进程。2002年12月,东盟第8次领导人会议决定,商讨2020年将东盟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计划。这标志着东盟地区一体化态度的重大转变,因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东盟并没打算要让东盟一体化发展为类似欧盟的共同体。如1997年推出的东盟《2020年展望》并没有提及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最终目标。2003年10月,东盟第9次领导人会议发表了第二个《东盟协商一致宣言》,决定建立更广泛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国家将组合成三个共同体,即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2004年,东盟第10次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东盟到2010年的工作计划,即《万象行动计划》,提出具体政策措施,要把东盟地区建成统一的生产和生产基地,并通过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建立FTA和EPA巩固与区域外大国的经贸关系。2005年12月,第一届东亚峰会确定东盟为东亚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组织者。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 <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Ibid

“Vientiane Action Programme,” <http://www.aseansec.org/VAP-10th%20ASEAN%20Summit.pdf>

(三) 区域化政策和中、日与东盟关系的发展

表-5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关系发展做了简短的概括。1997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发生了重要转折。1997—2000年,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加强,并开启了新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使中国—东盟关系朝制度化方向发展。虽然日本—东盟关系也取得进展,但发展速度比较慢,因为日本—东盟关系比中国—东盟关系起步早得多。日本和东盟从1977年就开始进行多边磋商,建立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并开始经常性的领导人互访。中国和东盟则在1990年才开始正式的接触与交往。

表-5 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关系发展 (1990—2005)

	1990—1993年	1994—1996年	1997—2000年	2001—2005年
中国—东盟	双边政治关系脆弱,多边关系尚未形成	缺乏相互信任,“中国威胁论”和南中国海争端激化产生负面影响,东盟想借助多边机制规范中国的行为	双边政治关系加强,多边对话与合作制度化,并朝多层次、多领域方向发展	相互信任增强,从经济、政治对话与合作拓展到安全国防对话与合作
日本—东盟	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希望从以往集中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对话关系转向政治和安全领域	日本提出一些加强与东盟关系的主张,但只是口头宣言	多边对话与合作得以扩展和深化,向多层次、多领域方向发展(尤其在桥本执政时期)	日本希望提高国际地位,尝试与东盟共同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政治与安全问题。由于担心中国与东盟走得更近,小泉希望加强日本与东盟国家双边关系

比较图-6和表-7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和东盟区域化政策的一致性是导致中国—东盟关系自90年代末以来以更快速度发展的主要原因。图-6表明,1999年中国与东盟高层领导人互访次数开始攀升,2000年开始超过日本与东盟高层领导人互访的次数。此外,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1997—2005年),中国—东盟建立了27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6个部长级机制,只比日本和东

盟建立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少 6 个,而日本和东盟建立起这 33 个对话与合作机制却用了 28 年。

表 6 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领导人^{*}互访(1990—2005)

年份	中国—东盟	东盟—中国	总和	日本—东盟	东盟—日本	总和
1990	9	5	14	4	10	14
1991	9	7	16	11	5	16
1992	25	10	35	9	10	19
1993	18	13	31	10	9	19
1994	9	11	20	6	6	12
1995	10	13	23	11	11	22
1996	9	13	22	9	8	17
1997	14	12	26	10	13	23
1998	8	11	19	15	16	31
1999	11	25	36	14	16	30
2000	17	18	35	17	25	42
2001	28	28	56	13	13	26
2002	21	15	36	10	10	20
2003	17	20	37	8	17	25
2004	18	18	36	13	3	16
2005	22	25	47	11	12	23

* 领导人包括部长和部长级以上的领导人。

资料来源:根据新华社, *Japan Times* 和日本外务省网站资料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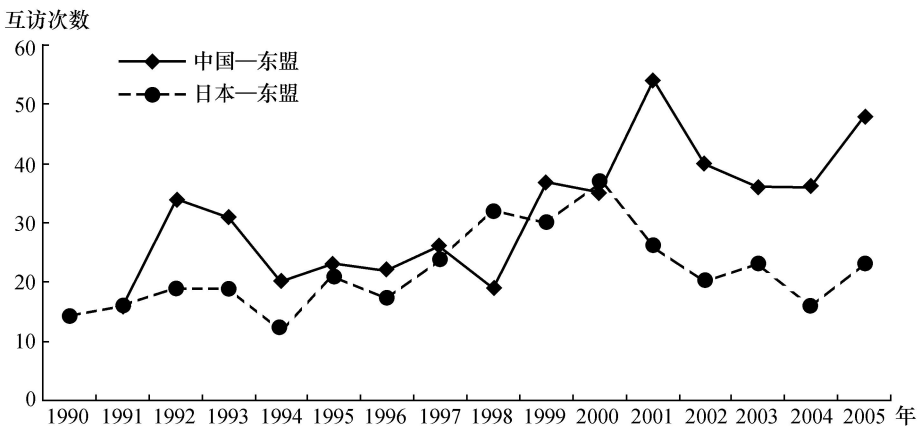


图-6 中、日与东盟领导人互访比较(1990—2005)

表-7 中、日、东盟区域化政策演变

	1990—1993年	1994—1996年	1997—2000年	2001—2005年
中国	积极争取与东盟建立政治关系,以参与区域多边活动	开始参与东盟主导的多边区域组织,吸取经验,消除对多边组织的疑虑	积极响应东盟发起的东盟“10+3”东亚合作机制	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态度积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并积极和主动地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日本	反对区域一体化;对区域合作并不积极	认识到区域合作的趋势不可阻挡,从而被动参加有限的区域合作活动,如1996年举行的ASEM会议	对东亚区域合作(如“10+3”机制)的态度仍不很积极,主要参与金融和货币合作	参与东亚区域合作,但仍说多做少;口头支持东亚一体化,抛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原则性的构想,但缺乏实际行动
东盟	开始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不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对此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东盟一体化的步伐,及推动大东盟的形成	进一步加快东盟一体化的步伐;积极和主动推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整合,以增强东亚地区在多方面的合作	把东盟一体化推向制度化发展,最终建立东盟共同体;积极推动东亚合作的扩展和区域化的进程,希望东盟占据中心地位

表-7显示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和东盟调整了其区域化政策,使双方的区域化政策更加一致,而中国、日本和东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与中、日和东盟关系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1991年,马来西亚倡议建立 EAEG。虽然日本没有积极响应,但并没有给日本—东盟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当时东盟其他成员国对 EAEG的态度也不积极。不过,到了 20世纪 9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后,东盟国家对促进东亚合作形成了共识。此时,中国和东盟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积极性自然而然地把中国—东盟关系拉得更近。日本则对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表现得较为消极。1997年危机后,日本试图建立 AMF,但因美国的反对不得不最终放弃。与此同时,中国则与东盟携手推动“10+3”东亚合作进程。进入 21世纪,日本才开始对中国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做出积极反应,但仍然显得缺乏诚意,事实上也无所作为。

五、结 论

冷战结束后,中、日与东盟关系发展一快一慢,对此存在着不同解释。结构性原因,如美苏两极格局的消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东盟政治关系能在1996年赶上日本—东盟政治关系。但同样的原因却不能对中国—东盟关系自90年代末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日本—东盟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作出比较完整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和东盟区域化政策一致,而日本和东盟区域化政策不一致是导致这一时期中、日与东盟关系发展一快一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接近使得中国—东盟关系快速扩展并得以深化。中国选择与东盟一致的区域化政策主要源自战略考虑,不愿看到危机后的东盟继续弱化,失去其独立自主能力,最终倒向美国。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使中美矛盾加剧,促使中国更坚定地认为必须推动多极化的目标,防范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围堵中国。中国积极响应东盟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有助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增强互信,因为当其他大国开始质疑东盟的重要性并对东盟失去信心和兴趣的时候,中国却让东盟觉得是一个忠实的伙伴。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助于消减东盟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其带来严重经济冲击的担忧,并且让东盟觉得中国的发展将会带动东南亚地区的共同发展。

日本的区域化政策同东盟的区域化政策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日本奉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外战略,而无法在美国和东亚(或亚洲)之间做出选择。因此,日本积极推动泛亚太的区域合作,而不支持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日本领导人,尤其是小泉,大力提倡“开放式地区主义”和“软性地区主义”,因为日本不愿见到东亚地区形成类似欧盟那样封闭、高度制度化的共同体。日本一味坚持追随美国的政策使其无法与东盟联合起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只有回归亚洲,日本才能真正地参与东亚一体化。除了美国因素的牵制之外,日本的金融与经济困境也使其难以在东亚地区发挥较大的经济作用。此外,日本国内政局动荡也是日本区域化政策陷入瘫痪状态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日本首相频频更换使日本无法随着形势发展调整区域化政

策。从 1990年到 2001年小泉上台,日本一共更换了 6位首相。虽然再三发表所谓“重要政策宣言”以推进与东盟的政治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但日本给东盟国家的总体印象是说的多而做的少。与中国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展示出的积极性和灵活性相比较之后,东盟国家对日本日益不满,认为日本在推进与东盟政治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上缺乏诚意。例如,小泉想方设法扩大东亚峰会参与国的规模,其主要目标显然是希望平衡“10+3”东亚合作的影响,防止中国和东盟走得更近。

东盟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希望把东南亚经济整合到东北亚经济中去,防止东盟边缘化。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和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给东盟国家经济带来日益强烈的竞争压力。而中国积极响应东盟有关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设想,本身就是对东盟的支持和肯定。因此,东盟希望借助中国的经济实力推动东盟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当然,东盟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以自身为主轴,将外围各国连接起来,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而巩固和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

作者简介

向钢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1985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威慑、军事决策与博弈分析。

电子邮箱: xianggh_03@em.tsinghua.edu.cn

王永县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966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获工业企业电气化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决策理论与管理决策优化。著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与战略》(2000年)、《运筹学》(1993年)。

电子邮箱: wangyx@em.tsinghua.edu.cn

王莉欢 1986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新加坡政府任职。

电子邮件: laifoonwong@pacific.net.sg

阎梁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5级博士研究生。1995和2001年分别在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任助理研究员。著有:《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

电子信箱: yanliang05@mails.tsinghua.edu.cn

潘成鑫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院讲师。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为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安全。论文曾发表在 *Alternatives, Political Science* 等学术刊物上。专著 *Underst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an Emerging Superpower*, 将由英国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出版。

电子信箱: chengxin.pan@deakin.edu.au

李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7、1990和199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政治、中美经贸关系。著有:《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年至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1998年)、《知识经济对策:运作与案例》(1998年)。

电子信箱: yowang@pku.edu.cn